

研究論文

# 腐敗、官場想像與新自由主義理性 ——解讀宋思明現象

白若雲

## 摘要

針對電視劇《蝸居》中魅力四射的貪官人物宋思明在中國社會引起的波瀾，本文提出關於「腐敗」和「貪官」的再定義的問題，並採用話語分析並結合文本細讀和網絡受眾研究，闡述官場想像和新自由主義話語對「貪官」的再詮釋。它指出這部商業電視劇，折射出的是年輕的城市白領階層對權力和金錢的想像。《蝸居》所塑造的貪官形象，重新定義了甚麼是大眾可以接受的政府官員，挑戰了官方的反腐敗話語對腐敗的定義，為腐敗合理化和常態化開闢了新的社會文化空間。本文進而指出，官場想像和新自由主義話語是構成當今中國犬儒主義的重要方面。

關鍵詞：《蝸居》、腐敗、官場想像、新自由主義、犬儒主義

---

白若雲，多倫多大學助理教授，主要研究興趣包括：全球資本主義擴張背景下的中國媒體與通俗文化、後社會主義中國通俗文化的政治意義，以電視與新媒體為研究重點。電郵：rbai@utsc.utoronto.ca

---

Research Article

## Corruption in the “Realm of Officialdom” Narrative, and Neoliberalism: Making Sense of Song Siming, the Good Corrupt Official in *Snail House*

Ruoyun BAI

---

### Abstract

How is corruption understood in China? How do people feel about corrupt government officials? In 2009, a corrupt official character in the television drama hit, *Snail House* (*woju*), became a popular icon of charisma and masculinity among many young, urban viewers. By looking at the popularity of this character, known as Song Siming, this paper seeks to understand how meanings of corruption are changing in China today. Combining a close reading of the popular drama and vast numbers of online commentaries and paying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articulation between the text and the socio-political contex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Snail House* provides ample evidence of how corruption has been redefined and reframed by collective imaginations of “the world of officialdom” (*guangchang*) and neoliberal thinking and rationality.

The drama presents a set of ideological ambiguities. On the one hand, it challenges the official discourse of corruption and may therefore be considered subversive. On the other hand, it effectively encourages a reading of corruption

---

Ruoyun BAI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rts, Culture and Media and Centre for Comparative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Toronto. Research interests: Chinese media and popular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integration into global capitalism,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phenomenal growth of popular media, particularly television and new media, in post-socialist China

as normal and necessary, as can be seen from viewers’ comments on Song Siming. Many viewers seem mesmerized by his talents in managing social and human relationships and readily acknowledge but dismiss the fact that he engages in corrupt transactions. One can argue that such a representation of corrupt officials plays an active role in rationalizing and normalizing corruption. This paper further argues, drawing on Slavoj Žižek, that the valorized corrupt official figure exemplifies the prevalence of cynicism in the specific socio-political condition of post-socialist China.

Cynicism as a dominant structure of feeling among many Chinese young people, is nourished by neoliberalism (whether understood as a globalizing ideology of “free market” or as a kind of “governmentality” that stresses the manage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self) and a cultural imaginary about the stratum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These two normalizing discourses of corruption, internalized by a cynical middle-class that desires to get by in the world, laid the groundwork for the enthusiastic reception of Song Siming, an idealized corrupt official figure. In a strong sense, Song Siming is a middle-class construct that points to a profound moral ambivalence and an intense anxiety regarding survival in a highly competitive society.

**Keywords:** television drama, neoliberalism, official corruption, cynicism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Bai R.Y. (2013) Corruption in the “Realm of Officialdom” narrative, and neoliberalism: Making sense of Song Siming the good corrupt official in *Snail House*.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3, 177–200.

## 引言

2009年，一部取名《蝸居》的中國電視劇因為生動刻劃「房奴」、「貪官」、「小三」等社會焦點問題而迅速紅遍大江南北，演員張嘉譯因飾演該劇中倍受歡迎的市委秘書宋思明而被評為《新周刊》雜誌「年度中國臉」(《新周刊》，2010)。耐人尋味的是，宋思明其實是個不折不扣的貪官，這在劇情中已有明確的交代。但就數以萬計的網絡評論和研究者的個人觀察而言，人們似乎不願把他看作貪官，反而津津樂道於他的個人魅力、為官之道以及同年輕女子海藻的愛情。為甚麼一個貪官不被看作貪官？甚麼樣的官員即使貪腐也被大眾心理接納？「貪官」這個標籤到底貼在哪些人身上？這裏，我們發現「貪官」這個文化概念的定義並不是黑白分明的。與官方表述和大量主流文化產品相比，《蝸居》裏的「貪官」形象顯然已發生重大改變，人們在談論宋思明的時候，也不斷地重新定義甚麼是貪官。也就是說，電視劇《蝸居》已經毫無疑問地參與到關於「貪官」意義的生產的過程中。本文借用文化研究關於意義生產的基本理論框架，認為意義的生產一方面不能離開文本，另一方面更與文本、觀眾和接受環境的相互作用息息相關。

本文從文本解讀和觀眾分析兩個方面來探討在當代中國文化、社會語境中，「貪官」界限的重新劃分。研究「貪官」如何在流行文化中被重新界定，可以幫助我們揭示商業電視劇是如何以它特有的方式，重新詮釋和影響着腐敗這個社會、經濟、政治熱點問題，並揭示它如何同中青年都市觀眾一起，在官方反腐敗話語體系的邊緣地帶，構建腐敗這一政治文化概念和社會經濟現象的多重複雜的含義。何為貪官？這樣一個看似簡單的問題，實際上並沒有一個明瞭的答案。在貪官與清官之間，電視劇製造出一些游離於二元對立框架之外的概念，即「能辦事的官員」、「官場中人」、「很不錯的貪官」、「成功人士」等等，這些遠離道德領域爭論的概念，不僅通過宋思明這個人物形象得到充分的闡述，並且在都市觀眾談論、評價《蝸居》的過程中得到進一步的強化。在理性層面，對政府官員的評價與道德水準脫離，為人們對官員貪腐行為作出合理化解釋提供了空間。在官場想像和新自由主義話語體系裏，宋思明被看作有能力的官員，他不僅深諳為官之道，在官場

游刃有餘，而且是為老百姓做實事的經濟管理能人。在感性層面，宋思明的個人魅力又使得眾多女性觀眾為之傾倒，他將事業有成的中年男子的睿智、成熟、與多情融於一身，令無數中國男人遜色。宋思明，這個「是也不是，不是也是」的「好貪官」，體現了當代中國社會深層次的道德徬徨，以及在一個競爭激烈的商品社會中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和適者生存法則的群體衝動和願望。

## 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包括電視劇文本分析與網絡調查，並結合報刊、文獻等研究資源，以《蝸居》作為社會文本進行多角度的考察。研究者不僅觀看了整部電視劇，也參考了20餘部1995年至2007年間播出的反腐敗題材電視劇，以求更全面地理解宋思明這個人物形象。本文的受眾研究結合了網絡調查和觀眾深度訪談。研究者於2010年上半年花了大量時間觀察分析四大網站上的有關評論：「優酷」（大型視頻分享網站）、「迅雷」（大型影視下載網站）、「人人」（中國大學生中極受歡迎的社交網絡，前身是「校內」）和「百度」（最大的中文搜索網站，同時提供大量網絡討論空間）。在這些網站裏可找到關於《蝸居》數以千計的長篇討論和不計其數的短評。研究者瀏覽了大量網頁直到歸納出一個相對穩定的論述和討論模式。同時，研究者着重研究了那些引來大量網友回覆的評論，並根據主題選取了幾篇評論以及對它們的回覆進行深入分析。依靠網絡進行研究的局限性是顯而易見的。首先，絕大部分的評論和回覆都是匿名的，這讓研究者對研究對象的背景信息很難把握。其次，研究者無法與網友進行交流。這種情形讓我們想起過去依賴觀眾來信進行受眾研究的時代。但研究者認為，研究人員不應該因為網絡調查的局限性而放棄使用網絡空間豐富的研究資源和信息，原因如下。一、對網絡評論做系統研究至少可以讓研究人員瞭解在網絡空間的主導觀點，而網絡空間是當今中國社會生活構成的一個重要層面。我們有理由相信網絡空間裏的主導觀點能夠影響網民對某一事件的看法，並且以往的研究證明網絡空間和網絡外社會的互動和滲透是相當活躍的(Yang, 2009)；二、很多網評不僅論點清晰，而且闡述觀點

十分詳盡，這有助於研究人員就某一特定觀點進行深層次分析，解構其話語表述邏輯。

## 完美男人的重新詮釋

新浪網作了一個網絡調查，題目是「如果在現實生活中，你處在海藻這樣一個角色，你會選擇宋思明還是小貝？」截至本文成稿，共13,489人投票，其中接近一半人(6549位)選擇了宋思明，21%的人選擇了小貝，19.8%選擇了「不好說，真的很矛盾」，另外10%「願意重新找個更好的」。<sup>1</sup>再舉一例，有人在優酷網上發起了一個問卷調查，題目為「發現自己好迷戀宋秘書，你呢？」。<sup>2</sup>截至2010年1月29日，一共有3,140人回覆，其中2,537人(78%)同樣選擇了「我也好迷戀」，另有165人(5%)選擇「我只是臨時迷戀」。在大量網評中，可以找到如下對宋描述的詞語：「完美」、「迷人」、「無法抗拒」、「有魅力」、「自信」、「成功」、「有能力」、「成熟」、「冷靜」、「理性」、「穩重」、「有深度的男人」、「有自控力的男人」、「有責任心」、「真誠」、「有思想」、「真摯有同情心」、「睿智」、「有知識」、「讓所有女人都心動的男人」、「有男人味兒」等等。

雖然以上數據同時顯示，宋思明是個有爭議的角色，但我這裏着重分析他從那些方面顛覆了電視螢幕上貪官的形象，成為二十一世紀中國的偶像級人物。首先，在很多人看來宋思明是位成功人士。他中年，身材高大結實，給人以安全感；他的着裝總是一絲不苟；他有錢有勢，喜開「陸虎」；他吃西餐、打高爾夫等等。但是，和王曉明刻劃的九十年代中國「成功人士」的形象不同(2000: 29)，<sup>3</sup>宋從不風風火火，身上不帶錢包，因為總有下屬和商界朋友給他打點一切日常瑣事。他雖然不去音樂會，但如果女兒要去聽S.H.E的演唱會，他可以去電公安部門讓其加強現場的安全防範。總之，宋思明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富商或官吏，而是精通商場和宦海而又風度翩翩、不落俗套的現代升級版成功人士的濃縮。

其次，宋思明被認為是一個成熟、冷靜、睿智甚至還極富同情心的人。大量網友指出宋的人文情懷讓他的形象好於一般的政府官員。

在劇中有一幕，海藻和宋散步時候拾起路邊一個蝸牛。海藻問宋他第一眼看到這蝸牛的時候有甚麼感受。宋答到：「我在替它擔心啊，它這麼慢，這麼小，這麼弱，需要在這個複雜的大千世界裏按照自己的步調行走，隨便誰一個無意的腳步都會把它踏扁了，我很捨不得。」（見第29集）也許在宋的眼裏，貧困戶李奶奶就是這樣一隻蝸牛。她拒絕動遷使她成為「蝸牛」抗爭的代表性符號。就在建築承包商陳寺福因為不能完成拆遷任務對李奶奶惱羞成怒的時候，宋卻建議陳作出讓步，並警告陳：「任何時候，利潤都不可能實現最大化，當你在追求最高利潤的時候，其實也就把自己的路給堵死了。」（見第10集）這就使觀眾更容易把宋思明和現實生活中冷漠殘忍的地方官員和資本家區分開來。劇中還有很多類似的表述，比如，海藻想為姐姐姐夫還高利貸，面對宋思明時又感覺難於啓齒，宋寬慰她道：「現在的社會太現實太殘酷了，沒有人再認為親情是重要的了。但我告訴你，凡是錢能解決的問題，就不是大問題。人這一輩子，有許多困擾是無法解決的，比方說生老病死，比方說眾叛親離，比方說勾心鬥角，比方說不再相愛。所有的這一切，都比房子啊，鈔票啊要嚴重得多。一個人可以背金錢的債，卻不能背感情的債。背金錢的債你有還清的希望，而背了感情的債也許到死都會愧疚。」（見第11集）這段話已被網友摘錄下來，在網上作為金句廣為流傳。

第三，雖然主創人員竭力否認宋思明與海藻在一起是出於真愛，但不管怎樣，二人完全不像街頭小報中好色的貪官和愛錢的情婦，倒像是真心相愛的情侶。宋思明不好色，文本暗示他喜歡海藻是因為她讓他回憶起在大學裏初戀的感覺；海藻不愛錢，她接受宋思明是因為他在她和姐姐最困難的時候幫助了她們。二人從邂逅到同居，一切發生得都那麼自然，似乎無可厚非，以至很多在網上留言的觀眾對二人的情感持同情、認可的態度。以「迅雷在線」的一段題為「我只說宋」的留言和回覆為例。該留言分析了宋思明的悲劇，指出他如果若不是陷於情色，應該能夠成功地經營一生。本文作者把所有的回覆進行了整理，根據對二人感情的態度把每一條回覆歸類，去除不相關以及重複的內容，結果發現，認為宋思明對海藻有真情的回覆有284條（82.6%），反對的有60條（17.4%）。在上面提到的「迷戀宋秘書」的網友

投票中，喜歡宋思明的網友佔總數的78%，和這個案例產生的數據相差甚小。至於網友是如何被宋思明感動的，以下兩段留言頗具代表性：「我喜歡宋，喜歡他對海藻的愛，那麼一心一意，在撞車離去的那那嘴角呢喃的還是對海藻的牽掛，如果我是海藻的話也會愛上他，只可惜這樣的男人在現實中太少了。」<sup>4</sup>、「不管他是不是貪官，在女人的字典裏他就是最合適做老公的，他利用自己的聰明投機取巧，反而就是他這種聰明使我喜歡他，只是他的一個眼神讓我們足以明白，愛並不是言語可以表明的，很多時候看着他就會有一種安全的感覺，他總是那樣的重情重意，那樣的無微不至，女人一生不都是在追求這樣的愛嗎？」<sup>5</sup>很多觀眾希望這對有情人終成眷屬，所以對宋思明死於車禍，海藻流產並失去了子宮這樣的結局非常不滿，認為《蝸居》的結局是一個敗筆，完全是為了通過廣電總局審查的需要，畢竟宋思明是貪官，是不應該有好下場的。

值得一提的是，對於宋思明是否真愛海藻，觀眾的意見分歧很大。喜歡宋思明的，一般來說在二人關係裏看到真愛，而把宋思明看作貪官的，則傾向於把海藻當作情婦。但持有宋思明根本不愛海藻這一觀點的觀眾，不能從文本中找到直接依據，而只能從「貪官」或「婚外情」這個前提出發，突破文本的強大誘惑，得出「沒有真愛」或者「愛情不道德」這樣的結論。但這些觀眾不得不對文本做逆向解讀這一事實本身就說明宋思明的「貪官」形象是何等的「反叛」，而這樣「反叛」的形象卻得到無數觀眾的認可，又足以證明了文本的果效。

簡而言之，《蝸居》製造出一個當代中國社會完美男人形象，他有權有錢，坐擁龐大的經濟資本、政治資本、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處於社會結構金字塔的頂端，他所代表的是成功；而小貝和蘇淳則代表了失敗。因為沒錢沒房，小貝最終失去了他的最愛，而蘇淳則天天看着老婆的臉色過日子。雖然不少網友非常同情他們，但很少有人把他們當作自己的榜樣。而在普通人的想像裏，位高權重、一擲千金的達官貴人往往是好色、冷血、貪婪，有誰能像宋思明一樣懂得真愛，並且有浪漫的情調，成熟穩重的氣質，和悲天憫人的情懷呢？於是宋思明滿足了人們對權力、財富的幻想以及對溫情的渴望，他是一個神話，一個「溫情脈脈」的資本的神話。在這個神話裏，與房地產商的勾

結美化為運籌帷幄的能力，收受回扣成為應得的報酬，用「貪婪」這個詞來形容宋思明於是變得很牽強，很多觀眾認為宋思明根本就不貪。但我們不應該把這個宋思明「洗白」的過程簡單化，好像只要把這個貪官刻劃得美好一點，就會自然得到觀眾的認可。我在下文中將說明，在文本本身的力量之外，觀眾關於腐敗現象的各種認知亦會深刻地影響他們對《蝸居》的解讀；我們在探討貪官的再定義過程時不能忽視大眾的官場想像和新自由主義話語在當代中國的影響。

## 官場想像與腐敗合理化

對「官場」的想像給宋思明的行為舉止賦予了新的解釋，深深地影響了人們對宋思明的評價。他不再是普通意義上的貪官，而是混迹官場、春風得意但卻不小心落入對手陷阱的一個官場中人。網絡空間裏一個主導觀點是，宋思明是一個深諳官場之道的人。他「既不好也不壞」，「既不對也不錯」。他不過是一個「甚麼也改變不了只能適應社會的人罷了」。<sup>6</sup>他只不過是遵守官場的遊戲規則。就像下面的評論所代表的，這部分觀眾雖然對宋缺少讚美之辭，但他們卻為宋作為政府官員的道德缺失開脫。「宋無非就是一個深諳官場之道，再加上一些智慧和城府，於是在官場如魚得水的人。但你要說他是個好人，我不同意，他已經不能用好和壞來衡量了，其實就是個麻木的服務於現實的沒有靈魂的人。」<sup>7</sup>觀眾們從該劇中還有如下心得：「當官要與商人律師等各種各樣的人搞好關係，並要學會運作關係，建立自己的關係網絡相互利用，比如商人想利用你手上的權想給你送錢，律師可以幫你從局子裏撈人等等。宋思明已經深諳此道。另外雖然貪污受賄包二奶擁有多處房產，但是貪官們必須要學會低調做人，不能吃好穿好，也不能大把大把地花錢……」（黃朝峰，2009）；「宋是很多成功人士該深思的角色。當斷不斷，為情所困。他應該在中途退出官場，去創業，定能做一番大事業。他依然抱住官字不放，政治是這樣的。玩火不可以太久了」；<sup>8</sup>「宋最後其實是被海藻害了，這部戲其實還給像宋一樣的男人提了一個醒：要懂得珍惜家庭，要耐得住愛情轉變為親情後的寂寞才能把握住你最在乎的權位，才能安穩地登頂！」<sup>9</sup>

官場想像為觀眾解讀《蝸居》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解讀工具。相當多的評論認為，下令調查宋思明和其所代表的貪腐集團的市委孫書記很可能比宋思明還要腐敗。劇中有這樣一個細節，一次宋在孫書記的辦公桌上看到了一本像是年代久遠的古書。宋知道這書在古玩市場中一定價格不菲，稱讚孫書記品味不俗。孫書記稱是別人送的，根本不知道它值多少錢。不少觀眾認為這個細節已經足以證明孫書記本人就不乾淨，只是他自己假裝糊塗罷了。而宋思明出事，只是因為他在派系鬥爭和利益角鬥中「站錯了隊」，所謂的反腐鬥爭不過是政治傾軋。在這場勾心鬥角中，市長才是孫書記想搬倒的政敵，而作為市長秘書的宋思明不可避免地成為政治鬥爭的犧牲品。有趣的是，《蝸居》中，市長幾乎沒有露面，市長和孫書記之間的矛盾似乎更是空穴來風。而且孫書記的戲份也很少，即使出現在鏡頭裏，形象也是非常正面的，即使辦公室擺放着別人送的古書，人們完全不必因此把孫書記和腐敗聯繫起來；比如有人可以說，如果古書是別人賄賂給孫書記的，他怎麼會如此不顧忌影響把它擺出來呢？由此可見，部分《蝸居》觀眾可以熟練運用官場話語體系來積極地詮釋劇中的人物和情節，並加入自己的想像為文本添置意義；從這個角度講，他(她)們已經游離於官方話語之外。

官場想像顯然與中國共產黨的自我定位相左。事實上，「官場」這個提法本身因為帶有濃重的封建社會的色彩，在1949年共產黨建立政權後曾一度消亡。就連「官」本身也由「幹部」取而代之，因為「官」是代替封建帝王統治人民，而「幹部」則是革命政黨和群眾之間的紐帶，宗旨是「為人民服務」。在後毛時代，「官」這個字重新出現在人們的日常用語裏，如「當官兒的」、「清官」、「貪官」、「官場」等等。同時晚清時期流行文化裏的官場想像再次浮現。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李宗吾的《厚黑學》(1912年成書)。雖然該書一直被共產黨列為禁書，但卻在1989年由求是出版社重印並公開發行，並在一年內發行量達到25萬冊。從此有關「厚黑」書的出版一發而不可收。官場想像的核心是，官員看似受政黨的組織原則支配，而實際遵守的是官場潛規則，實踐的是官場關係學，即「厚黑學」。人民利益或公眾利益對他們來說不過是幌子，他們只關心自己政治前途和「錢」途。他們擅長於欺上瞞下、相互勾結、

爾虞我詐、落井下石、官商勾結、官官相護；他們貪財好色，最擅長搜刮民脂民膏。同時官場是個大染缸，有理想、正直的人在其中難立足，他們要麼選擇同流合污，要麼選擇退出，要麼就身敗名裂。

官場想像之所以能再次風靡當代中國，有深層的政治經濟原因。首先它與後毛時代的政治經濟結構巨變有着密切關係。經濟改革賦予了地方政府前所未有的對公共資源的掌控，政治權力在市場經濟中迅速商品化，擁有政治權力的黨政幹部比其他社會群體更易掌握經濟權力，他們當中的一大批人利用各種合法與非法手段，打着「經濟發展」、「改制」的幌子將大量的社會財富據為己有或劃歸身邊的經濟利益集團，其結果是出現了以黨政幹部為核心的中國官僚資產階層，他們對社會資源近乎瘋狂的掠奪直接傷害了公眾利益，九十年代以來，眾多的圍繞強拆、強徵、官員腐敗、工人下崗、國企改制等焦點問題所爆發的集體抗議活動，更加顯示了官員（及其所代表的資本）和民眾之間的對立關係。在這個背景下，含有階級對立色彩的「官」一詞的重新出現顯得順理成章，而「官場」想像中醜惡的官員嘴臉契合了中國老百姓對地方黨政幹部的痛恨，諷刺官場為人們發泄心中不滿情緒提供了出口。

在討論宋思明的時候，出現了很多這樣的評論：「哪個官做到了清正廉明瞭呢？宋不對？其實他演的就是現實生活中的官啊，只是他演出來你說他不對，可是現實生活中的官你管得了嗎？他們那些官是否真的像電視劇中的一樣好人好報、惡人惡報呢？不都是官官相護嗎？而且等他們老了退了、不也都把他們的下一代、兒女孫女提到的官位了嗎？誰又能怎樣呢？我有個很遠很遠親戚、他在哈爾濱。他下來之後還有很多送禮的、而且還把他的姑娘女婿都當官了，還有他的孫女外孫女孫子都是官、誰又能怎樣呢？」<sup>10</sup>又如，「當今社會何來清官呢？這個社會是無官不貪的社會……誰不貪誰就是白痴……當官當官，當官就是為了貪。」<sup>11</sup>「真懷疑現在有沒有清正廉潔的官了？天下烏鴉一般黑，現在被查處的是宋等人，下次估計就是孫書記他們了也不一定呢。」<sup>12</sup>這些論述不僅顯示了大眾對政黨政府精英們的普遍不信任，也顯示了官方話語與大眾話語的嚴重錯位。

不過，雖然官場想像是社會不公、階級對立的產物，它所蘊含的

情緒並不是單一的憤怒。這就提到後毛澤東時代官場想像的第二個層面。恰恰因為黨政幹部不僅對龐大的社會資源擁有分配權力，而且自身佔有大量經濟資源，這個群體在以金錢為主導的商品經濟社會，擁有巨大的魅力和神秘感。能否進入以官員為中心的關係網絡，往往成為個人成功與否的關鍵。而同時，國家的公務員考試制度為大學畢業生向基層幹部群體流動提供了可能，於是成為這個群體裏的一員已經成為很多年輕人的職業理想。近10年內，每年報考公務員的人數逐年遞增，從2003年的八萬多，一直升到2009年的100多萬，和2011年的200多萬。<sup>13</sup>如果說底層老百姓對官員腐敗和其他社會問題感到憤恨、失望與無奈，那麼對於經濟地位居中、有一定的社會流動性的人們來說，官場則是一種搖擺的、矛盾的情緒的集合點，它的面目既可憎又可愛，有時可憎，有時可愛；對官場的諷刺與開脫，責罵與妥協，鄙視與利用共存，形成了中產階層有趣的官場想像。於是，對希望步入仕途的年輕人來說，官場小說就是他們的教科書，10幾年前王躍文的《國畫》和最近在網絡空間紅極一時的王曉方的《駐京辦主任》更是關於官場遊戲的紅寶書。很多對政治本身不感興趣的普通職員，對官場百態也充滿了興趣，因為在他們眼中，官場和職場有巨大的相似性，下屬如何經營與上司、同事的關係，如何在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已經成為一門高深的學問。關係學被很多學者看作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在世紀之交的中國官場或職場關係學的興盛有着不可忽視的當代特性，人際關係的高度商品化、金錢化、貪腐化，政治和經濟權力的高度集中和統一，以及市場經濟和全球化帶來的高度競爭的叢林社會，都奠定了官場話語及其延伸出的職場話語在當今中國大眾文化中的霸權地位。

因此，對官場想像蘊含的批判性，我們必須進一步的探討，以分析這種批判的局限性在那裏。在「腐敗無處不在」和「腐敗十分正常」間其實有着細微難分的界限。例如下面的論述：「不過我一直覺得宋思明收別人好處然後把項目給他們做 也不算是很嚴重的違紀行為啊，商人跟政府部門關係處的好的多得是，多多少少總是有些處在邊緣地帶的受賄行為，現在的人送禮也送得很有手段，很難查到，他怎麼就栽了呢？」<sup>14</sup>因為貪腐不可避免同時又是正常行為，宋的所作所為並不能讓

他變成十惡不赦的腐敗官員。這樣的論述讓批評腐敗的聲音變得不合理，也抑制了關於腐敗的辯論。我們可以看下面的對話。一個網友說：「這個吧裏有些人太炫耀自個兒了吧，宋是貪官，當他把人民的血汗錢放進自己腰包，他的道德已經淪喪了，即便他再溫柔再本事。」這個帖子立刻招來另一個網友的反擊：「你這話說的太形式了，太官方了，太報紙了。你身邊沒有當官的親戚朋友嗎？不當官的親戚朋友用甚麼途徑多賺錢你不知道嗎？說這些話，太冠冕堂皇了。哪個官沒點外快，全中國上億官有一個算一個，小到小學老師，幼兒園老師，都算上，哪個乾淨。你做，你也一樣。」<sup>15</sup>

由此可見，官場想像本身蘊含着矛盾，可以在某些狀況下被特定社會群體使用而變成為洩憤的渠道，但由於它缺乏歷史感，把當前中國政治制度的缺陷全部歸咎於似乎是一成不變的官本位文化，不能對經濟改革中大規模的腐敗這一特定歷史現象做出結構層面的分析、解釋和批判，所以很容易陷入「腐敗常態化」的結論，在事實上為腐敗行為進行開脫，推動了將腐敗常態化的進程。在以官場話語體系為主導的討論中，探討腐敗問題變得非常不合時宜，非常幼稚，非常主流，非常不「酷」。這樣的姿態看似叛逆，但事實上將腐敗問題邊緣化，拒絕對其作出任何道德批判。當然，道德敗壞不能夠解釋如此猖獗的腐敗現象，但官場想像在超越對個人腐敗行為的道德批判後，並不能對腐敗現象或行為提供新的更有說服力的解釋，而僅僅歸咎於「官場」，好像腐敗問題的根源就是官場、官本位，這種解釋實際上掩蓋了改革開放以來腐敗的本質，是在於中國當代官僚資本集團大規模地迅速地將公有財產私有化，從而完成資本原始積累的運動。

## 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個體與「腐敗」問題的邊緣化

除了官場想像之外，新自由主義話語為詮釋宋思明提供了另外一個重要視角。這裏新自由主義有兩種意味。作為一種政治經濟哲學，新自由主義的核心內容是自由市場（參見Harrison, 2006；Wang, 2003）；作為一種對身體的統治、管理方式，新自由主義產生出新自由主義個體，該個體將市場機制內化，不依賴政府福利，而是通過不斷

挖掘自身的潛能，不間斷地約束管理自己，趨利避害，實現自己在市場中的最大價值(參見Ong, 2006; Rofel, 2007)。我們先談作為政治經濟理念的新自由主義。主張自由市場決定一切的人認為，政府在經濟領域的主要作用應該是幫助建立市場，只有當市場失控的時候，政府才應該介入；相應地，對官員的評價應該主要基於他作為政府人員是否為推動市場化作出了貢獻。他也許腐敗，但如果他有能力，通過培育市場實現經濟發展，那麼他總體上還是個好官。近年來，土地流轉是最有效的提高GDP和增加政府收入的方法，各地方政府都忙不迭地進行「圈地運動」(何清漣，1998；舒泰峰、李曉明，2010)，將強徵的土地賣給開發商，這些開發商向各部門官員提供巨額賄賂或回報，腐敗交易的成本又轉嫁到納稅人和購房者頭上。同時，儘管黑幕重重，環城高速、寫字樓、購物中心、商業住宅拔地而起，城市的面貌還是在世人面前日新月異，促成這些變化的地方政府官員因此而飛黃騰達，被褒獎、受重用，被譽為敢於大膽創新的改革家。正如Yan Sun所言，「人格和政治信仰等非經濟因素被統統束之高閣。」(Sun, 2004: 165)腐敗也就成了次要問題或者不是問題的問題。

由此可以看出，新自由主義和鄧小平的「貓論」是一脈相承的，因為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表現就是拋開在意識形態領域的爭論，以經濟建設為綱，大力發展市場經濟，只要一個官員的貪腐程度和他(她)的經濟貢獻(比如GDP高增長)成正比，就可以被接受(Harvey, 2005)。因此我們不難理解，從八十年代以來，共產黨的反腐敗鬥爭其實一直都受到經濟發展這個「硬道理」的制約；我們也不難理解，為甚麼地方官員對反腐敗格外地反感，因為反腐敗不僅不能在短期內帶來GDP的增長，反而束縛了所謂「能人」的手腳(Sun, 2005; Wank, 1999)。不僅政治精英對反腐敗持陽奉陰違的態度，「經濟發展才是硬道理」這個論述也被精英階層之外的很多國人所認可。在作家周梅森寫的不少涉及腐敗問題的政治經濟小說和電視劇裏面，新自由主義話語力量表現得格外突出，如《我主沉浮》即是其中一部。《我主沉浮》裏的腐敗市長錢蕙人讓人充滿同情，因他是一個極富魄力、勇於創新、將一個落後城市變成經濟強市的幹將，但由於他被該省保守勢力所詬病，屢遭打壓，心生不平，通過不法手段為自己撈了好處。這樣的角色在周梅森的其他

電視劇裏也都有表現。在《蝸居》裏，創作人員雖然沒有凸現宋思明的經濟管理能力，卻讓他針對清官貪官這個問題有如下的論述：「我始終認為，錢只是一種途徑，卻不能作為最終目標，做清官容易，不過博得死後的好名聲。而做好官難，因為你的職責，不是為了博個後世好聽的名聲，而是要切切實實做點事情。獨善其身，聽起來很高尚，其實很愚拙，一個不懂得變通的人，一個不懂得迎合低級趣味的人，是不能在這個世界上生存的，如果世人皆醉我獨醒，那麼瘋的是自己。現在的社會，你不認識人，沒有後台，就只有被欺負的份啊！」（第15集）宋思明將自己定位成一個促進商業發展的中介人，他暗示腐敗是做實事的前提，所以是一種「靈活變通」，是一種能力，一個優點。這裏我們還看到，雖然新自由主義話語和官場話語有很大的不同，但由於都拒絕對腐敗進行道德層面的質疑（更不要說結構性批判了），這二者實際上是相通的，是可以相互轉化相互支持的。換一種說法：現實/社會/官場就是這樣，你不去適應它，不靈活變通，就等於自動出局，更別想「切切實實做點事情」了。

以下的網評可以看作是新自由主義話語的具體體現：「不要看是不是有權，而是看他怎麼辦事情，說貪官太幼稚，當官的哪有不是貪官的。」<sup>16</sup>「所以，面對貪污，並不要眼睛裏揉不進一粒沙子，只要他為民造福的功績遠高於他的貪污數目，他就算是個好官。」<sup>17</sup>「宋有別人沒有的頭腦和手腕，這不是壞事。現實需要這樣的人。精煉。能幹。」<sup>18</sup>觀眾能夠對宋思明產生認同感是因為他們將他看作是一個能幹的人，而不是腐敗的官。但如果說《我主沉浮》格外渲染錢惠人的經濟創新能力，《蝸居》根本沒有表現宋思明如何促進經濟，所展示的幾乎都是他如何利用個人關係為親戚朋友謀好處，或者勾結開發商從政府那裏騙取廉價土地。這說明了以下兩點：一、認為宋思明是辦實事、有能力的官員的觀眾加入了自己的想像，使宋思明和自己頭腦中的好官員形象相吻合，話語的力量得到彰顯；二、「能力」被再定義，一個有能力的官員就是擅長利用各種關係辦成事，辦成的事只要促進商業發展，至於是否損害了公共利益、中飽私囊，就不太重要了。這第二點和上段宋思明的自述相吻合，新自由主義摻雜了官場話語，二者共同重新詮釋了甚麼是有能力的官員，甚麼是中國社會需要的官員，在這再定

義的過程中，貪官與清官這兩個傳統意義上的概念面臨出局。

新自由主義不只是一種經濟哲學理念，更是一種福柯所說的統治方式(governmentality)(參見Bruchell, Gordon & Miller, 1991)。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話語，其力量作用於個人身上，實現對個體的統治。學者們發現，在中國，新自由主義的話語力量常表現為對「素質」的強調(Anagnost, 2004)。九十年代後期開始，中國城市裏的大中型企業改制、倒閉產生出大量下崗工人，雖然改制的過程充斥着腐敗，雖然工人們抗議的聲音此起彼伏，主流媒體則是強調下崗工人必須提高自身素質，適應社會，同時創造出各樣的再就業明星，為下崗工人們樹立自立自強的榜樣(孔書玉，2011；Won, 2004；Yang, 2007)。鼓勵人們自立自強似乎不是問題，但問題是，這背後的含義是讓這些處在社會底層的人們放棄對國家的合理訴求，放棄對下崗過程中的不平等權力關係進行質疑，將下崗這一社會矛盾私人化，將憤慨轉化為自責。「提高素質」這一話語不僅限於下崗工人，還同樣運用於其他階層和群體。Faye Xiao在探討電視劇《中國式離婚》時指出，女主人公林曉楓只有通過提高自身素質，把自己改造成為一個知性女人、消費女性，才有可能重新贏得丈夫的愛與尊重，也就是說，「愛是一種能力」(Xiao, 2010)。為了塑造這種能力，新世紀以來湧現出大量各樣的關於生存法則的暢銷書，教導讀者如何適應在各種「場域」的競爭，比如官場、職場和情場，職場作品《杜拉拉升職記》以小說、電影和電視劇的方式大熱，就連諜戰劇《潛伏》也被解讀為辦公室政治大全(朱麗麗，2011)。這裏我們看到，新自由主義和官場話語再次相遇——適應社會是一種能力，一種素質。

那麼適應社會、提高素質究竟意味着甚麼？《蝸居》給出的回答是模稜兩可的。海萍和海藻是一對反差極大的角色。姐姐海萍獨立堅強，堅信憑藉自己的雙手可以在大城市扎根，得到她想要的幸福，因此雖然工作並不順利，生活充滿艱辛，她始終在努力進取，在工作之餘兼職教外國人學中文，因為她肯動腦筋，成為優秀的中文老師，最終開辦了中文學校。而妹妹海藻沒有主見，胸無大志，不愛吃苦，所以沒能禁得起金錢的誘惑，成為宋思明的情人，放棄了工作，過上「二奶」的生活。全劇以海萍的獨白結束。她引用巴菲特，告訴妹妹成功沒

有捷徑。她說，「只要你有信念、有追求，只要你堅持，那你一定會比隨波逐流行得遠行得正。就像宋思明，他很聰明，他是非常聰明也很有才華。但他如果能選擇一條正確的路，選擇正確的價值觀，我相信他的前途會無量的。但他恰恰沒有這樣做。他恰恰憑着自己的一時聰明，選擇了一條投機之路，最終還是隨波逐流了。海藻，我在這個城市算是扎根下來了。我相信憑我的堅持，憑我的努力，最終會過上我想要的日子。」(第33集)很顯然電視劇主創人員是要肯定海藻的價值觀，也就是肯定個人奮鬥；很多觀眾認同海藻也是因為她堅強面對挫折，努力奮鬥，從這一點上看，《蝸居》有一點勵志作品的味道。但再細究下去，可以發現《蝸居》裏的奮鬥遠不只是個人的努力與勤奮，而更多的是這種奮鬥建立在對權力關係依附的基礎上。海藻的成功與幸福，如果沒有宋思明在她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危機時伸手相救，是不可想像的。更重要的是，由於生活的重壓，當海藻的奮鬥觀與現實形成矛盾時，她不得不作出讓步，成為一個在很多觀眾眼中自相矛盾甚至有些虛偽的角色。比如她對丈夫無錢買房的現狀感到格外沮喪時，提醒妹妹不要迷信愛情找一個一無所有的窮光蛋：「愛情，愛情那都是男人騙女人的把戲。甚麼『把我的心交給你，你會永遠擁有我』，那都是一窮二白的窮光蛋的障眼術。他那是甚麼都沒有了，就說點甜言蜜語。男人若真愛一個女人，先拍上一摞票子，再奉上一幢房子，將來即使沒有男人，你的身體還有着落。」(第10集)遵循這樣的邏輯，海藻後來拋棄小貝投入宋思明的懷抱不是無可厚非嗎？一方面海藻對妹妹的二奶身份感到不安，另一方面，正如海藻所說，宋思明有恩於她家，在接受了宋思明的權勢帶來的種種物質和社會利益之後，她已經不能讓妹妹懸崖勒馬了。在她身上，要強、獨立的個性和對權力、金錢的敬畏共存，雖然在丈夫蘇淳面前頤指氣使，但在宋思明拜訪她家的時候則顯得手足無措，不斷詢問宋飯菜是否合口味。當海藻第一次來到宋為妹妹準備的豪華公寓的時候，她滿是敬畏之情，小心翼翼地環顧四周，並斥責蘇淳忘了脫鞋。可以說《蝸居》中的奮鬥、努力、堅持、追求和信念都被功利哲學和消費文化所籠罩。適應社會、在叢林般的競爭環境中勝出成為年輕人奮鬥的最高目標。這應該是新自由主義在當代中國社會的一種隱晦但又強而有力的表現形式。於是乎宋思

明不再是腐敗分子，而成為眾人敬仰的對象。

當然，說宋思明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時代英雄是對《蝸居》的誤讀。實際上，《蝸居》裏充滿了矛盾的信息和情感，它之所以能夠在廣大城市白領和大學生觀眾中引起共鳴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劇中小人物生存在現代都市裏所遭遇的困苦、背叛、無奈和矛盾。在鋪天蓋地的網評和報刊評論裏，《蝸居》被稱為是一部現實性非常強的電視劇。這裏，觀眾所說的現實包含着兩個含義。一是指電視劇是現實社會的忠實寫照；二是指電視劇所反映的現實是殘忍的，在這種現實裏，理想、愛情、道德與良知已變得不那麼重要。寫實和殘忍共同構築了「現實」的內核。把這種邏輯推向極致，對美好事物的嚮往是虛假的、不現實的。也就是這樣的邏輯使得批判腐敗變得可笑。所以，《蝸居》所描述的殘酷「現實」就是唯一存在的「現實」，任何對現實的反抗都是沒有意義的。去奮鬥也就意味着接受社會現實並讓自己去適應它，無論社會現實是多麼的荒謬。拒絕質疑社會現狀變成奮鬥的應有之意。同時對殘酷現實的感嘆瀰漫在《蝸居》的網絡空間裏。面對現實的殘酷，面對危機和對失敗的恐懼，除了個人奮鬥，無路可走。如果危機感是激發人們「隱性潛能」從而形成新自由主義個體的途徑(Anagnost, 2009: 201)，那麼《蝸居》為我們提供的是一個新自由主義的完美文本。中國年輕男性從小貝的遭遇學到的是叢林法則：社會不會強迫你去成功，但是它會告訴你甚麼是失敗。

## 結論

本文通過分析《蝸居》以及它所引發的網絡熱評，特別是魅力四射的貪官人物宋思明在中國當代社會引起的波瀾，指出這部主要針對年輕的城市白領受眾的商業電視劇，折射出的是這一社會群體對權力和金錢的想像。《蝸居》所塑造的貪官形象，在中國電視屏幕上恐怕是史無前例的。它重新定義了甚麼是大眾可以接受的政府官員，挑戰了官方的反腐敗鬥爭路線，質疑了公共道德，顛覆了反腐話語對腐敗的定義。但與其說它對社會問題做出了更深層次的批判，不如說它更加掩蓋了社會問題，為腐敗合理化和常態化開闢了新的社會文化空間。

本文作者認為，宋思明是城市白領階層的官場想像和新自由主義理性相結合的產物。二十一世紀的官場想像與晚清小說固然有相通之處，但經歷整整一個世紀之後，官場想像在後毛澤東時代捲土重來，這說明我們對官場想像的探討不能僅限於傳統文化的影響，更應該置於當代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大環境中去考量。新自由主義理性就為官場想像提供了豐厚的土壤並為之披上冠冕堂皇的外衣。在市場至上的社會裏，衡量一個個體價值的重要標準就是是否能夠實現自我治理、自我潛能最大化。在不斷經營自我的過程中，將權力和人際關係商品化似乎是一種理性的選擇。作為結語，作者將把對官場想像與新自由主義理性的討論進一步深化，指出它們是構成當今中國犬儒主義的重要方面。歸根究柢，宋思明現象指認出的是一種犬儒主義。

本文德國學者彼得·斯勞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在《犬儒理性的批判》一書中作出著名的論述，他認為在當代西方，犬儒主義已成為一種社會主導意識，它「源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學生運動的解體，從那個時刻起，希冀化為對現實的妥協，反叛化為帶有小聰明的鬱悶，大規模的政治對抗化為無數小範圍的亞政治認同，政治的激進化為明智的中庸之道」(89頁)。斯勞特戴克關於犬儒主義的論述得到西方很多學者的認同，包括弗雷德里克·詹姆遜斯(Fredric Jameson)和拉沃熱·齊澤克(Slavoj Zizek)。齊澤克認為意識形態主要通過犬儒主義起作用，「然而在今天這個犬儒的時代，意識形態可以將自己統治的秘密(愚民，也就是傳統的、前犬儒時代的意識形態試圖掩蓋的秘密)大白於天下，而絲毫不會影響它的統治效果」(1996, 201頁，原文斜體)。所以，如果說馬克思認為意識形態表現在「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但他們還是在那樣做」，那麼以犬儒為核心的當今社會的意識形態則表現為，「他們很清楚自己在做甚麼，但他們還是在那樣做」(Zizek, 1989, 25頁)。具體到本文，宋思明是個貪官，這一點毫無疑問，但很多人不願把他當作貪官看待；腐敗盛行，這一點毫無疑問，但很多人不願討論腐敗，甚至為腐敗開脫或積極地參與到腐敗中去。在他們眼中，所有試圖帶來社會公平的努力都是白搭，所有理想都是烏托邦，唯一理性的選擇就是接受現實，適應社會，學會潛規則，謀求自己在社會的一席之地。這就是當今中國意識形態的一個重要表現和作用方式。這

樣看來，在任何有關中國社會問題、社會穩定和政權合法性的探討中，對犬儒主義的批判都不應缺失。

不過，作者不認同犬儒主義已成為中國社會的主導意識。囿於篇幅，本文不能就這個問題展開。也許在某些特定社會階層，犬儒主義的影響面很大，但絕不應該是整個中國社會。每年十幾萬起的群體抗議活動所表現出來的怨恨情緒，與犬儒主義的玩世不恭形成鮮明反差。而即使是玩世不恭的犬儒階層，犬儒主義也未見得就是一成不變的，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它也許會轉化為激進的力量。這些還有待進一步考察。本文的探討限於活躍在網絡空間的人們，他們很可能是生活在城市裏的大學生或者各種層次的白領，不太可能是農民、農民工、工人或者退休軍人。但無論如何，宋思明這一案例都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瞭解和剖析在飛速發展變化的當代中國社會中權力、金錢和社會道德，以及個人理想之間如何相互作用，而流行文化又是如何消化和演繹由此產生的矛盾和困惑的。

## 註釋

1. 調查結果可在 <http://eladies.sina.com.cn/qg/wojuhouse/index.shtml> 找到。
2. 調查結果可在 [http://kanba.youku.com/bar\\_barPost/barid\\_D2BQNA5gVWAIPA==\\_subjectid\\_1860260](http://kanba.youku.com/bar_barPost/barid_D2BQNA5gVWAIPA==_subjectid_1860260) 找到。
3. 王曉明曾這樣刻劃對九十年代中國「成功人士」的形象。「它通常是男性，中年，肚子微凸，衣冠筆挺。他很有錢，開着簇新的寶馬車去自己的辦公室；他也可能在美國留過學，養成了西式的習慣，在懷揣即將與外商簽訂的商業合同，匆匆跨出家門之前，不會忘記與美麗的太太吻別；他還很講究生活的情趣，周末打幾杆高爾夫球，晚上還要去聽交響音樂會……」
4. 於2009年11月18日16:05時發布的留言，回覆「我只說宋」。「我只說宋」可在 <http://movie.xunlei.com/comment/68577> 找到；該留言的具體位置是第二頁。
5. 這是第33樓一位署名「月瑤蓉」的網友於2009年11月28日11:39時發布的留言，回覆「我發現自己好迷戀宋秘書」。該留言可在 [http://kanba.youku.com/bar\\_barPost/barid\\_D2BQNA5gVWAIPA==\\_size\\_20\\_subjectid\\_1860260\\_page\\_2.html](http://kanba.youku.com/bar_barPost/barid_D2BQNA5gVWAIPA==_size_20_subjectid_1860260_page_2.html) 找到。
6. 這是第17樓一位署名「冷冷太陽月光」網友於2009年11月26日21:08時發

- 布的留言，回覆「發現自己好迷戀宋秘書」。
7. 於2009年12月4日17:49時發布的留言，回覆「我只說宋」
  8. 於2010年5月3日1:49時發布的留言，回覆「我只說宋」。
  9. 於2010年1月29日00:26時發布的留言，回覆「我只說宋」。
  10. 署名「左脚丫」的網友於2010年1月20日11:23時發布的留言，回覆「我只說宋」。
  11. 第87樓一位署名「星星航航」的網友發布的留言，回覆「發現自己好迷戀宋秘書」。
  12. 於2009年11月25日15:03時發布的留言，回覆「驀然回首，那人已不再燈火闌珊處」，可於<http://movie.xunlei.com/comment/75810>找到。
  13. 信息來自國家公務員網：[http://www.chinagwy.org/html/xwsz/zyxw/201108/21\\_31349.html](http://www.chinagwy.org/html/xwsz/zyxw/201108/21_31349.html)。
  14. 這是一署名為perhaps candy 的網友發布的留言，回覆「被電視劇《蝸居》裏的那個海藻噁心到了」，可在<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uninfo/1/1558829.shtml>找到。
  15. 該對話於2009年11月21日發生在百度蝸居吧的211.138.184和221.201.155兩個網友之間，回覆「作為一個男人，不得不說宋思明這個人物很男人」。見<http://tieba.baidu.com/f?z=665531891&ct=335544320&lm=0&sc=0&rn=30&tn=baiduPostBrowser&word=%CE%CF%BE%D3&pn=120>。
  16. 第184樓名「老老帥了」的網友在2009年12月29日22:20時發布的留言，回覆「發現自己好迷戀宋秘書」。
  17. 第37樓名「雪落芙蕖」的網友在2009年12月3日12:14時發布的留言，回覆「發現自己好迷戀宋秘書」。
  18. 於2009年11月30日16:40時發布的留言，回覆「我只說宋」。

## 參考文獻

### 中文部分 (Chinese Section)

- 王少文 (2010年3月20日)。〈《新周刊》09電視榜揭曉 海清張嘉譯同獲中國臉〉。取自新浪網，<http://ent.sina.com.cn/v/m/2010-03-20/19412903405.shtml>。
- Wang Shaowen (2010, March 20). *Xinzhoukan 09 dianshibang jixiao Hai Qing Zhang Jiayi tonghuo zhongguo lian*. Retrieve from: <http://ent.sina.com.cn/v/m/2010-03-20/19412903405.shtml>.
- 中國互聯網路資訊中心 (CNNIC) (2010)。〈第25次中國互聯網路發展狀況統計

- 報告)。取自中國互聯網路資訊中心網站，<http://www.cnnic.cn/uploadfiles/pdf/2010/1/15/101600.pdf>。
- CNNIC (2010). 25<sup>th</sup> zhongguo hulian wangluo fazhan zhuangkuang tongji baogao. Retrieve from: <http://www.cnnic.cn/uploadfiles/pdf/2010/1/15/101600.pdf>.
- 孔書玉 (2011年1月)。〈下崗女工，苦情戲，及中國電視劇的多層語義空間〉。「時代媒介：華人社會的電視劇文化工作坊」，香港。
- Kong Shuyu (Jan 2011). Xiagang nvgong, kuqing xi, ji zhongguo dianshiju de duoceng yuyi kongjian. Shidai meijie: huaren shehui de dianshiju wenhua gongzuofang, Hong Kong.
- 王曉明 (2000)。〈半張臉的神話〉。王曉明 (編)，《在新意識形態的籠罩下 - 90年代的文化和文學分析》(頁37-41)。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 Wang Xiaoming (2000). Banzhang lian de shenhua. Wang Xiaoming (Eds.), *Zai xin yishi xingtai de longzhao xia 90 niandai de wenhua he wenxue fenxi* (pp. 37-41). Nanjing: Jiangsu renmin chubanshe.
- 朱麗麗 (2011年1月)。〈諜戰劇中的歷史呈現與現實解讀——以《暗算》《潛伏》為例〉。「時代媒介：華人社會的電視劇文化工作坊」，香港。
- Zhu Lili (Jan 2011). Diezhan ju zhong de lishi chengxian yu xianshi jiedu: Yi ansuan, qianfu wei li, shidai meijie huaren shehui de dianshiju wenhua gongzuofang, Hong Kong.
- 何清漣 (1998)。《現代化的陷阱》。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
- He Qinglian (1998). *Xiandai hua de xianjing*. Beijing: jinri zhongguo chubanshe.
- 舒泰峰、李曉明 (2010)。〈任玉嶺：房地產須破既得利益〉。《瞭望東方週刊》，第10期，頁30-32。
- Shu Taifeng, Li Xiaoming (2010). Ren Yuling: Fangdichan xu po jide liyi. *Liaowang dongfang zhoukan*, 10, 30-32.
- 黃朝峰 (2009)。〈看完《蝸居》的反思〉。《觀察與思考》，第24期，頁9。
- Huang Chaofeng (2009). Kanwan woju de fansi. *Guancha yu sikao*, No. 24, 9.

### 英文部分 (English Section)

- Anagnost, A. (2004). *The Corporeal Politics of Quality*. *Public Culture*, 16(2), 189-208.
- Bruchell, G., Gordon, C., & Miller, P. (1991). *The Foucault Effect: 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arrison, G. (2006). Serving the Market or Serving the Party: Neo-Liberalism in China. In R. Robison (Ed.), *The Neo-Liberal Revolution: Forging the Market-State*. Basingstok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Harvey, D. (2005).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ng, A. (2006). *Neoliberalism as Exception: Mutations in Citizenship and Sovereignt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Rofel, L. (2007). *Desiring China: Experiments in Neoliberalism, Sexuality, and Public Cultur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Sloterdijk, P. (1987). *Critique of Cynical Reas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Sun, Y. (2004). *Corruption and market in contemporary Chin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Wang, H. (2003). *China's New Order: Society, Politics, and Economy in Transition* (T. Hutters, Tra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ank, D. L. (1999). *Commodifying Communism: Business, Trust, and Politics in a Chinese cit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on, J. (2004). Withering Away of the Iron Rice Bowl? The Re-Employment Project of Post-Socialist China.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39(2), 71–93.
- Xiao, H. F. (2010). “Love is a Capacity”: the narrative of gendered self-development in Chinese-Style Divorc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9(66), 735–753.
- Yang, G. (2009). *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Citizen Activism Onlin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Yang, J. (2007). Reemployment Stars: Language, Gender and Neoliberal Restructuring in China. In B. S. McElhinny (Ed.), *Words, Worlds, and Material Girls: Language, Gender, Globalization*.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Zizek, S. (1989).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London: Verso.
- Zizek, S. (1996). *The Indivisible Remainder: An Essay Schelling and Related Matters*. London: Verso.

## 本文引用格式

- 白若雲(2013)。<〈腐敗、官場想像與新自由主義理性——解讀宋思明現象〉。  
《傳播與社會學刊》，第23期，頁177–200。

